

一味低调非良策



■鲁平

同一个地区，有的市县好故事常有，好声音不断，新闻舆论工作积极稳健、有声有色，让人感觉朝气蓬勃；有的市县则沉闷无声，让人觉得暮气沉沉，记者去采访，也是能不说就不说。

为何不发声？答曰：领导有交代，“低调，一般不宣传”。

“低调”的理由看似充分，实则站不住脚。笔者经常在基层调研采访，以此为由不重视新闻舆论工作的不少见，大抵有几种情况。

有的地方主要领导年龄临界，最后一站，升迁无望，自认不需要；有的履新不久，没出政绩，感觉“不到火候”；有的谨小慎微，把新闻报道等同于出风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认为宣传是虚头巴脑，多说无益，少说为妙；有的地方主要领导不在状态，碌碌无为，确属“无话可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退一步讲，就算领导干部确实是谦虚低调、不事张扬，也不能把一个地方的新闻舆论工作片面地理解为耍嘴皮子、哗众取宠做表面文章，从而在媒体上失声失语。一个地区现况如何，发展思路怎样，面临什么难题……不仅本地群众关切、在外工作的游子关心，其他地区也会不同程度地给予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干部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就是重视公众知情权，就是善于凝心聚力、成风化人。运用舆论工具宣传真理、动员群众、传播经验、指

导工作，是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的必备本领。

毋庸讳言，一些地方主要负责同志还不适应媒体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骨子里仍然把新闻舆论工作当成花瓶，认为它是软性的、务虚的，中看不中用，只要不添乱，就可有可无。有的觉得新闻传播只是一门单纯的业务性工作，交给宣传部门就了事，不过问、不关心、不重视、不支持。还有的同志思维停留在“防火防盗防记者”阶段，不懂得同媒体打交道，至于说运用新闻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疏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更是不擅长。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

新闻媒体是各级干部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忽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作用，或者“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不重要”，往小了说，是缺乏作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媒介素养；往大了说，是对新闻舆论工作在治国理政和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缺乏应有的了解。其实，个人的低调风格和对一个地区的新闻宣传，并不矛盾。一些负责同志，平时个人谨慎低调，但对当地的新闻舆论工作从来都是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仅善于通过接受采访来确保公共政策透明、权力运行透明，也坦然真诚接受舆论监督，积极响应社会关切，疏导社会情绪。

在新形势下，运用新闻媒体推进治理的能力，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不仅需要具备，而且必须修习好。

兰州交大三名“学霸”给校长写了“建议信”，指称“试题过于简单”，希望增加考试难度，“让不努力的同学疼一疼”。结果这封信公开之后，很多同学直言被这封信给刺疼了。

学霸们描述的试题，简单到了“只要考前翻过书就都能答上”“人人都是90分”的程度，所以觉得“比别人多学的50%知识好像白学了”。然而其他同学的感受完全两样。有同学告诉媒体，他所在的班级中，上学期就有11名学生英语挂科。有同校大三学生说，他所在的学院，每门课加起来，一个班有接近70%的挂科率，这样的试题都算简单的话，那什么是难呢？

可能的情况是，学霸觉得比别的同学付出更多，但在分数上拉不开距离，本应秀之于林，被不明显的考分差距给埋没了。但在调查情况与统计数据上，至少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客观。

大学校园里，“学习成绩好”与“考试成绩好”，两者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这就像我们未来走上社会的时候，成绩的好坏，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一样。离开学校，10年20年以后，分数相差三分五分的同学之间，可能觉得简直就是个事儿。甚至，当年考试成绩好的，可能会在社会的大课堂里“考”得稀里哗啦。这就涉及到大学教育的分数重要还是综合素质的培养更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大学里，考试能力与学习能力，是要区别来看待了。这时候可能真不能有太多的优越感。

大学里，如果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还把

画中有话

羡慕



儿童节到了，许多家长都给孩子准备了礼物，然而孩子需要的并不是玩具的陪伴，父母的陪伴才是他们最想要的礼物。
新华社发

学霸建言“疼一疼” 正是应试教育之疼

免费不应仅“六一”



■耿昕

又到一年儿童节，许多城市纷纷推出了针对儿童的优惠活动。儿童节当天，许多科技馆、纪念馆、公园等免费向少年儿童开放。然而，众多优惠措施在一天内一并到来，难免令孩子们应接不暇，分身乏术。

以儿童绝对数量之多，以博物馆相对数量之少，在“六一”一天内，营造出祖国的“花朵”荟萃的热闹场面，绝非难事。但是，科技馆仅靠一天“童满为患”，就能起到培养儿童探索精神、科学兴趣的作用了吗？仅靠节日期间的“例行公事”，对少年儿童免费开放几个收费场馆，上演几部儿童节目，就尽到了教育儿童、爱护儿童的责任了吗？这是远远不够的。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于1949年决定设立“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宗旨就是为了保障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而决非一朝一夕。这就要求，不光要让儿童在自己的节日感到快乐、幸福，还要实现全社会对儿童的重视与爱护。所以，真正对儿童

重视和爱护、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不应是儿童节一天的秀，而是一项长期、日常和潜移默化的工作。从关心儿童出发，为孩子们发掘潜在的能力创造良好环境，帮助孩子们乘着兴趣的翅膀快乐地飞向幸福未来，才是创立儿童节的目的所在。

因此，与其仅在节日期间“赶集”式地为儿童服务，还不如平日多想想儿童真正缺乏什么，需要的是什么。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儿童相比，我国儿童的身体素质差、创造思维弱、动手能力差，已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欧美国家的科技馆对儿童实施免费开放，并成为他们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教育、科技等有关部门的深思、反省和借鉴吗？近些年，各地博物馆逐步实现了免费开放，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博物馆的受众主要是有一定理解能力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适合较低年龄儿童（12周岁以下）的场馆仍然没有免费。

此外，我们与其关注节日的联欢活动，以及短时间的免费活动的热烈程度，不如多从儿童的幸福、快乐着眼，从满足儿童天性入手，着力解决儿童面临的日常问题。比如课业负担过重、书包越背越重、压力越来越大，等等。因此，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减轻儿童各种负担，让他们拥有一段真正快乐、幸福的童年回忆，应成为我们的各级教育部门和儿童工作者的工作重心。

■雪松

兰州交大三名“学霸”给校长写了“建议信”，指称“试题过于简单”，希望增加考试难度，“让不努力的同学疼一疼”。结果这封信公开之后，很多同学直言被这封信给刺疼了。

学霸们描述的试题，简单到了“只要考前翻过书就都能答上”“人人都是90分”的程度，所以觉得“比别人多学的50%知识好像白学了”。然而其他同学的感受完全两样。有同学告诉媒体，他所在的班级中，上学期就有11名学生英语挂科。有同校大三学生说，他所在的学院，每门课加起来，一个班有接近70%的挂科率，这样的试题都算简单的话，那什么是难呢？

可能的情况是，学霸觉得比别的同学付出更多，但在分数上拉不开距离，本应秀之于林，被不明显的考分差距给埋没了。但在调查情况与统计数据上，至少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客观。

大学校园里，“学习成绩好”与“考试成绩好”，两者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这就像我们未来走上社会的时候，成绩的好坏，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一样。离开学校，10年20年以后，分数相差三分五分的同学之间，可能觉得简直就是个事儿。甚至，当年考试成绩好的，可能会在社会的大课堂里“考”得稀里哗啦。这就涉及到大学教育的分数重要还是综合素质的培养更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大学里，考试能力与学习能力，是要区别来看待了。这时候可能真不能有太多的优越感。

大学里，如果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还把

每一次考试的分数看得那么重，还习惯了一分两分、十分八分的差别来体现学习的成就感、优越感，这就等同于进入了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循环往复中去了。这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应该被我们今天的大学课堂慢慢摒弃。

许多国外大学的学分制，并不像我们的大学那样，一分半分都抠得那么死，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是国际名校，不影响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综合素质。兰州交大的三位同学，可能把对于考试分数的努力与体现，当成了大学教育的素质全部。往善良的意愿来说，他们是希望给在书本学习上不努力的同学一种压力感，但是本质上还是想让考试成绩比自己差的同学，尝到一种失落感、失败感，是希望在别人的“疼一疼”中，尝到自己的“甜一甜”。这是把自己以为的成就和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一种分数优越感的心态。而实际上，大学课程，如果每门课还是以考试的分数来设计，设计到100个学生可以考出100个人的差距来，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利于培养人的落后设计，是育人的力气用错了地方。

原本我们就在痛恨这种考试机器式的教育方法，但考虑到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替代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选拔模式，所以大家都愿意也只能去接受。但是如果我们的大学，依然延续考试机器的这么一种教育方法，那么，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将是一批被分数完全格式化的考试机器，而不是具有综合素养的社会人才。所以从独木桥走过来的学霸，在对待考试的分数上，观念应有所更新，视野有所成长。